

邓小平的检讨、自述 和三封信

邓小平 著

群众出版社

2023 年 05 月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复辟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晚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比正确和富有远见的，雄辩证明了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如何评价邓小平，献上一首歪诗：

百色起义危难急，弃军逃跑我不顾；
遵义会议我在场，淮海战役我指挥；
住“牛棚”、打桥牌，吃牛排、喝茅台；
不读马列读金庸，不分黑白抓老鼠；
先富起来带后负，吹牛逼不打草稿；
永不翻案算个屁，说翻老子就要翻！
劝君莫跟我争辩，不换思想就开 tank！



目 录

出版说明	i
目 录	ii
经典照片欣赏	1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 年 10 月 23 日）	9
我的自述（摘录）（1968 年 06 月）	16
红七军工作时期	16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18
在太行工作时期	19
在北京工作时期	2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22
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的信（1972 年 08 月 03 日）	23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1976 年 10 月）	28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1977 年 04 月）	31
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完整版（1992 年）	32
一、夕阳斜照的傍晚，汉口火车站，专列会见室	33
二、阳光灿烂的下午，南昌，滕王阁休息室	34
三、华灯辉煌的夜晚，深圳迎宾馆，桂园	34
四、风和日丽的下午，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35
五、阴雨绵绵的下午，春节，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38
毛主席有关指示（1975-1976）	40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免责声明	45
无名网友歪词一首：	47
结束语	48

经典照片欣赏



大跃进时期鼓吹亩产万斤的“稻上飞人”



不仅 献花圈，居然还行军礼！简直奇耻大辱！
美国领导人怎么没见过去毛主席纪念堂献花圈、行军礼！

1979 年访问美国，给林肯塑像送花圈、行军礼



打桥牌



和孙子一起喝茅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被迫害”住的“牛棚”



走资派发动十月政变成功后的庆功宴



伟人和侏儒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年10月23日)

邓小平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

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

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

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

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的自述（摘录）

（1968年06月）

邓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의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

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

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

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零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

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

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1972 年 08 月 03 日)

(注：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

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

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

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注：以上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1976 年 10 月)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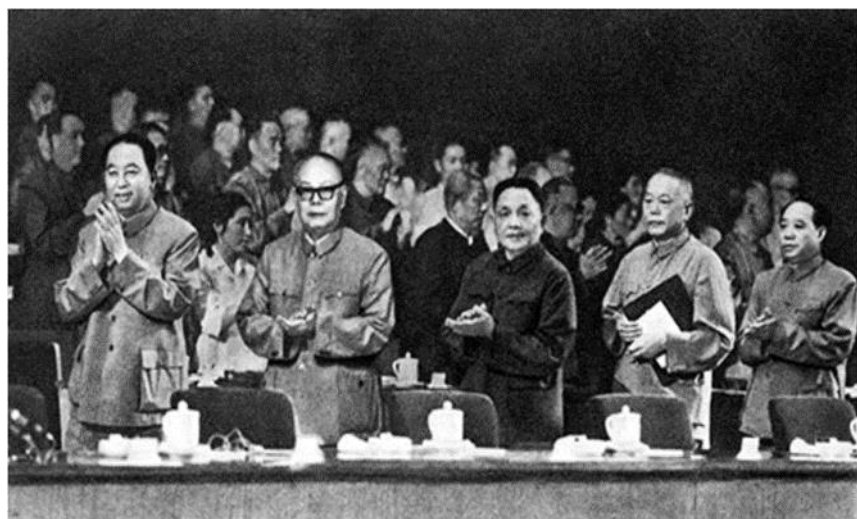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1977 年 04 月)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完整版

(1992 年)

编者按：邓小平，有个南巡讲话，大家也大概知道他讲过什么，但不一定见过他原汁原味一字不漏的版本。

邓小平：“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邓小平：“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 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邓小平：“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

以上，只是摘要。下面才完整内容。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不久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狂潮。

一、夕阳斜照的傍晚，汉口火车站，专列会见室

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那五年的经济大发展，你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也搞不下去。对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

“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速度。对我们这种基础薄弱的国家，6%不是什么成绩。我看连续5年超过10%是可以争取的。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归根结底，能发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挡。目前的经济工作没有新意，没有进取心、创造性，多数人不理解经济。没进取心就是没有历史责任感！”

“第四，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发展或发展慢了都不行。而怎么发展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

“暂时就这几点，没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

“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二、阳光灿烂的下午，南昌，滕王阁休息室

邓小平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我是个退休老头子，耳朵也不好使，（汇报）你就免了吧。”

“不过，我倒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跟你书记大人进点言：我离开江西二十年整了，这次来走走，好象这里变化并不太大呦。你的南边就是广东，你看广东就是热气腾腾的，发展很快，人家成天就是改革开放，你这里我看是有点冷冷清清。”

你给你们省委一班人讲，也可以给北京讲，就说我说的，改革开放是大局、大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空谈，只能误国。尤其是你这江西，底子很薄，资源不多，不努力改革开放行吗？你们什么时候改革开放真有成绩了，你们汇报我乐意听，现在，还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对了，书记大人，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你应该多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谁不改革开放谁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这话向北京报告。”

三、华灯辉煌的夜晚，深圳迎宾馆，桂园

老爷子一吃完晚饭仍兴致不减，把瑞林、毛毛、飞飞和刚到深圳会合的朴方、邓楠等全叫到了身边，他有话要说。

“大家今天也见到深圳了，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中国今后生存发展的希望。我想跟你们聊另一个问题。”

“你们猜猜，促使我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几个多月来，纠缠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

“还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呗？”飞飞迟疑着说道。

“有点对，但还不够直接。朴方，你说呢？”

“我想，”邓朴方犹豫了一下，干脆说道，“是苏联垮台？”

“对，是苏联问题！”

“离开北京前两天，瑞林给我讲了一个镜头，让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苏联垮台时，叶利钦宣布苏共在俄罗斯停止活动。叶一宣布，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那些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撤出大楼时，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让这些人通过。但伴随着这些工作人员的是什么呢？老百姓们的口水和垃圾！

一个执政了七十年，号称有几千万党员的庞然大物，就这么一夜之间垮了！要知道，苏联的住房、工资、资源、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都比我们国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和苏联吵架的时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按他的描述，苏联距共产主义也仅有一步之遥了。而共产主义，也是我们这代人过去的终生追求呀！”

“毛主席前期是靠实事求是胜的。打江山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每个人都自以为比毛有学问，但毛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唉，但后来，他也以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化身和发展。其实，他跟我一样，凡夫俗子一个。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四、风和日丽的下午，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邓小平：“人老了啰嗦，不过，我也啰嗦不了几天了。今天就给你们大家多啰嗦几句吧。”

“我们过去的革命常以苏联为榜样。但这些天，我想的最多的，也还是苏联。那么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深厚的文化传统，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庞大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垮了，消失了。苏联，我们过去顶礼膜拜的词语，一下子就成为历史陈迹，历史名词，值得我们深思呀！”

“苏联完了，全世界方方面面的思路很自然就联想到中国，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办？”

“其实，苏联垮台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讲，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论专政，不顾人民死活，而老百姓为了基本生活品还成天排队，我看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号称是发达社会主义，结果折腾了七十多年，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饱，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中国怎么办？中国就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我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能动摇。”（众人热烈鼓掌）

“昨天，我们家聊天，也聊起苏联垮台。孩子们告诉我，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两个重大的历史现象。政治上的重大历史现象，是苏联的崛起和消亡；在经济上呢？则是近三十年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两年，除了四小龙外，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也迎头赶上。四小龙和东南亚诸国的人有中国人聪明勤劳吗？我看未必。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长此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看除了实事求是这一条外，我今天还不能讲得很清楚。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就不要去争论，成天去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说，要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原则定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呀！”（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你们先别鼓掌。我得给你们一点压力。我刚才提到二十世纪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就是四小龙的崛起。中国怎么办？我看先别赶英超美，连日本我们也别去比。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龙学习，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实现小康。前些时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还不敢说，但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发展才不过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样子。再这样干下去，四小龙就没什么可怕了。我想，深圳、广东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是在全国杀出一条血路，做一个表率，率先超过四小龙。我看给广东二十年时间，赶上四小龙是可能的。”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和我率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别人围追堵截，但伯承同志提出两军相逢勇者胜。最后，我们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冬衣，装备很差的情况下，战略突进中原，直逼南京，我们是勇者，我们胜了！今天，我要给你们同样的一个战略任务，就是做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中国人搞经济不是孬种！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不管某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怎么说，搞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追上四小龙，用二十年的时间，把广东建成亚洲的第五条龙！”

“改革开放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特区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力，还可以解放生产力。所以，我发明了一条叫做不争论。争论什么？一争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办特区有争论，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农村改革也有争论，但是农村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是水产业和水果业，这恰恰是我们计划经济没计划，政府基本不管的行业。以前，北京的老百姓为了大白菜天天排队，由政府配发。但现在几个批发市场一搞，大白菜紧缺排队的现象就消失了。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

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

“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起码有这几点是看准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特区建设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制度的农村改革，以发展解放生产力为主旨的市场机制。”

“说起市场，又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是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主义。我提的在香港问题上搞一国两制，反对的人就少。在主权问题，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协，但在国强民富上，在发展生产力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协呢？还是那句真理：实事求是。中国穷，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我们不仅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在内地我们也要容忍和鼓励差别和市场机制。不这样，何来引进外资，何来改革开放？”

“去香港看回归是我的一个梦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经 88 岁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外出了，时间不饶人呀！你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中国的未来。80 多年前孙中山实现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我今天讲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讲，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讲。我在湖北和江西还讲过，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点你也讲！”

邓小平在为深圳特区题词

五、阴雨绵绵的下午，春节，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仅是中国古训，也是现代真理。历朝历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败者居多。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当代的毛泽东都是以秀才见长，他们当初的业绩都很辉煌，但一旦做出一个大文人的样子，都目中无人，最后结果凄凉。

“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大秀才，但他们操作性和务实精神都很差。党的事业在他们手里没

有发展起来，而他们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却以他的务实和实事求是赢得了认可。

“在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失败，核心还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敌进我退。但到秦邦宪、王明、李德这些书生当政，要搞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就失败了。八大以前，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党历史上有两个很不错的大会，一是八大，一是十三大，不错在哪里？不错就在实事求是。八大讲经济建设，毛退居二线，十三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惜，这两次不错的大会精神都没有贯彻下去。”

“文人误国。哈韦尔能怎么样说不清楚。苏联我看就是被戈尔巴乔夫的文人情结提前葬送掉，他只图自己的声望，而不顾党和国家的死活。而叶利钦是一个更看重声望的人。苏联要平静下来，一定得有一个更沉着、更务实、更有操作性的人才行。



毛主席有关指示

(1975-1976)

毛远新

(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有关指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

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

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中有中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

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伟人和侏儒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免责声明

——“邓小平的十个如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免责声明（“**十个如果**”），内容如下：

1、“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5 页）

2、“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又回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

3、“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问题。”（《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8 页）

4、“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4 页）

5、“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1 页）

6、“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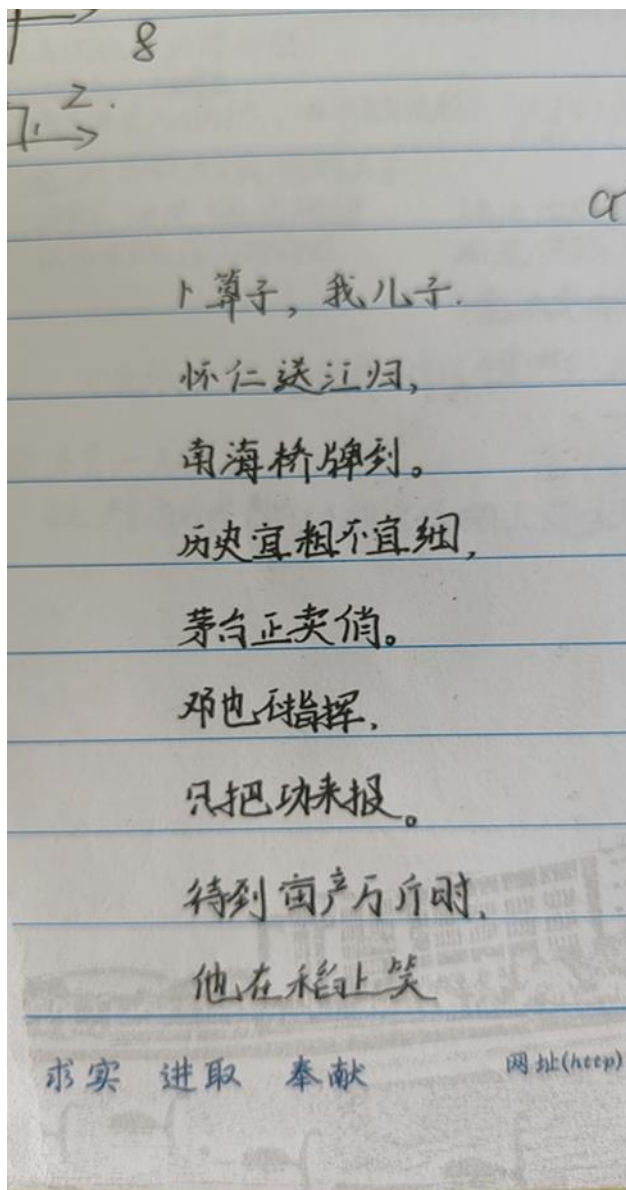
7、“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9 页）

8、“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4 页）

9、“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1 页）

10、“**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1 页）

无名网友歪词一首：



结束语

红色智慧



毛主席万岁

如果我们的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

